

面對少子化的 人才傳承與創新

文 |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臺灣進入人才斷層，再無作為，難與他國競爭。從學術界過度強調SSCI論文，成為研究替英語系國家代工，加上「產業代工與人才代工」三種代工地位與思維，讓臺灣人才斷層危機提早到來，且苦無對策！當年臺灣引以為傲的技職體系，在十多年來「升格」政策下，變身成為「科技大學」，在強調與向一般大學SCI、SSCI論文寫作的競賽下，早已失去為國人培育產業、經濟等現場實作人才等特色！

幾年前筆者曾應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編輯之邀，為「傳承與創新—育才篇」為序。該部書中許多年輕人透過科技部等項目補助，出國深造與交換，充滿對未來的璀璨盼望，進而預備在學術生涯中揚帆出航。欣羨年輕人接受補助後，分享前程似錦的歡愉喜悅，也難免對個人學術生涯再次百感交集。

二十年學界浮沉錄

回國工作二十餘年，前十年(1993-2002)臺灣高教的質量擴張之初，在大學排名與高教評鑑尚未全面推行之前，學

術同仁似乎比較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知道如何產生最好的研究內容。當時對於學術生命的追求，多發自內在動機，且備受學術自律規範之自我要求，要做個安身立命的大學教師也非難事。

到了第二個十年(2003-2012)，從2003年10月份，媒體揭露教育部2002年大學、技職校院在SCI(科學引文索引)、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與EI(工程索引)等期刊論文總篇數發表統計，開啓了國內整體高教「論文優先」的教育政策。當時人文社會為主的政大遠遠落於四十多名之外，一時社會為之譁然！

這一年大學評鑑也正式入法，成為

政府經費補助的重要憑據。此時，大學數量已兩、三倍成長，無論大學生人數或研究生數量上。大學在經費上或規模上也愈來愈緊張。其中最關鍵的要數教育部5年500億撥款政策，徹底改變了國內大學的生態，大學裡許多如「特聘教授」、「彈性薪資」、「研究特優」、「教學卓越」、「六年條款」……如排山倒海般蜂擁而至！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愈來愈多的外在指標、升等壓力、論文發表、經費競爭、科技部計畫……，教授變得愈來愈「宅」，關注點越來越功利導向：發表或淘汰(publish or perish)！過去的工作自由度與學術自主性相繼流失，教學愈來愈變成是干擾研究發表的因素！似乎每個人都背著沉重的論文發表壓力，工作步調愈來愈快速與量化導向，但相對的學術生涯俯拾皆是的靈感與樂趣，離人越來越遠(周祝瑛、邱韻如，2013)。

高教評鑑中教授地位的式微

美國史坦佛大學前校長Kennedy在大學中學術責任(Academic Duty)一書中提到：中外各國大學教授都有相似的經驗與挑戰。如：每一位教授都要從事教學工作；許多人爲了撰寫研究計畫與專著而向政府與民間爭取研究經費，同時

評論別人發表的作品；另外，也致力於社群的網絡關係(network)(楊振富譯，2000；Kennedy，1997)。然而近年來由於大學經費的緊縮及分工日益精細，許多先進國家的大學教授爲了養家餬口、增加收入以提升生活品質而忙於教學與研究計畫，並且多數人與社會上的公共議題保持距離，以示中立客觀。即使美國大學教授，由於各行各業的崛起，原先負有影響公共政策與喚起民智等責任的大學教授，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以致經常遭到外界批評(金耀基，2003)。

誠如史記商君列傳所言：「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也提到，欲讓社會改革朝向正面的改變需要公共知識份子的參與(Tu，1998)。可是在國內學術界因學術資源的激烈競爭與評鑑威權的宰制下，這些年來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身影愈漸模糊。

儘管臺灣學術界國際期刊論文每年以倍數之姿大幅提升，但其被國際引用率尚低，研究成果對解決社會問題，甚至能將研究結果供產業界使用者也不高，且研究主題與社會需求的差距，持續在擴大。尤其，新興的奇怪現象是，多數學界人士的履歷中出現在所發的表

期刊後面標示是否屬於SSCI、TSSCI等級的論文，以此來「驗明正身」，說明論文是出自「名牌」似的國際期刊，至於主題與內容品質如何，則不再是重點。許多人文社會領域與教育領域的教授升等，似乎只要有三、五篇「短、小、輕、博」的SSCI、TSSCI論文即可過關，而不問其研究水準、連續、周延與創新能否提出一家言，還有是否能出版較具系統的專書，成為教授層級的代表作，已經無關緊要。

大學評鑑為誰築夢？

尤其，近幾個月來，許多大學系所為了新一輪的系所評鑑而幾乎放下平常的工作全體動員。許多視為平常的學術工作，竟也被冠上「做業績」、「拚業績」等字眼！隨著一波波大學評鑑與五年五百億等頂大計畫，國內各大學為了「達標」而疲於奔命，許多人甚至過勞！這一連串的臺灣高教評鑑與論文指標實施迄今已逾十年了，結果到底誰受益？

有趣的是為了糾正這種「評鑑指標治國、論文指標治校」所衍生的異化現象，前教育部長蔣偉寧曾表示，未來大學評鑑應朝「去指標化」方向，鼓勵大學自我評鑑以發展特色。科技部主委

朱敬一也表贊同，從2012年開始專題研究計畫審查表上，不再列出SSCI等評定指標(但其他處司依然標榜)。事實勝於雄辯，整體高教政策至今在「去SSCI指標」上，仍缺乏具體作為，令人擔憂。

首先，目前大學法第五條規定大學應「自我評鑑」，但卻同時保留教育部「定期辦理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加上「其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賦予教育部合法評鑑權利等規定，各大學為了獲得教育部的補助經費，必須滿足上級單位的評鑑機制與指標，全國各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依然在各項獎勵及升等辦法中，以上述論文發表數量作為指標。加上國內大學校長多出自理工背景，對於修改校內相關辦法並不積極；立法等委員對此議題也甚少了解。一直到去年(2015)十二月十六日立法院終於三讀修正刪除上述條文「政府教育經費補助」之規定，將大學評鑑與政府補助脫鉤，此後大學評鑑僅作為各校調整發展的參考，不再做教育部經費補助之參考；該條文並增列大學評鑑應符合多元、專業原則，希望透過修法，改正過去許多大學校院受限於政府經費及招生管制，備受評鑑指標限制，不但盲目追求論文發表數量，造成

教學形式化，與影響學生受教權。這樣的修正可算是對於高教民意的回應，但後續效果與未來評鑑依據仍有待觀察與追蹤。

其次，當年臺灣引以為傲的技職體系，在十多年來「升格」政策下，變身成為「科技大學」，在強調與向一般大學SCI、SSCI論文寫作的競賽下，早已失去為國人培育產業、經濟等現場實作人才等特色！因此，過去倡導以SSCI等來加速臺灣「學術國際化」的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先生，近來發現國內學界因過度重視SSCI等指標化，導致臺灣學術與產業嚴重脫節、技職人力短缺與人才流失等問題。科技部主委朱敬一也曾警告：臺灣進入人才斷層，再無作為，難與他國競爭。從學術界過度強調SSCI論文，成為研究替英語系國家代工，加上「產業代工與人才代工」三種代工地位與思維，讓臺灣人才斷層危機提早到來，且苦無對策！

莫以外在指標限制學術熱忱

由此可見，解鈴還是需繫鈴人！直至今日，科技部除了人文處之外，其他單位仍未脫離SCI與SSCI指標，而教育部固然在立法院刪除相關評鑑與經費補助法規，朝向多元升等趨勢，但即將來臨

的後頂大經費補助，是否真能徹底改進上述指標化政策的侷限？甚至擺脫過去盛傳的學術資源被特定「學閥壟斷」等弊病？

例如，科技部等除了提出許多獎勵與扶植年輕學者發展機會外，是否還應儘速全面檢討現行的發表形式與規則（如根據SSCI發表數量與影響係數等指標）？而各大學在研究與教學上的分擔與比重上是否不應偏廢？如此才能提供一個健康的多元發展學術環境，讓年輕學者擁有安身立命、發展學術潛力及兼備學術熱忱的空間，而非完全以外在的指標，來規範個人的學術生涯，影響學術自主與各自的獨立判斷與選擇？

反之，如果高等教育政策繼續無視於「指標辦學」的後遺症，大學不能徹底對各種發表指標的「異化與物化」進行反思與批判，而學術界仍然漠視因SSCI等指標氾濫所帶來的對學術靈魂與大學教學淪落等影響，那麼臺灣高級人才的研究成果與社會所需人力之間的斷層現象，將愈演愈烈。畢竟在少子化浪潮襲捲與國內專業與基層人才不足情況下，高等教育中「指標治國」的各種後遺症，是應該重新導正的時候了。 